

· 政治学研究 ·

恩克鲁玛村社社会主义评析

王海涛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海涛 (197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摘要] 恩克鲁玛的村社社会主义是他寻求适合加纳国情的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虽然对于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他过于迷恋非洲原始村社制, 把其“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误当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把社会主义当作是恢复和捍卫原始村社制的手段, 因此, 他的村社社会主义深受非洲传统村社制因素的桎梏, 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关键词] 村社社会主义; 原始村社制; “人道主义”; “平均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155(2007)05-0014-04

克瓦米·恩克鲁玛在领导加纳人民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国家的政治独立后, 积极寻求一条适合加纳国情的发展道路, 提倡村社社会主义, 希望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反对新殖民主义、改造加纳, 试图使加纳在立足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他利用手中的权柄在国内轰轰烈烈地推行这一理论学说。然而, 在短短几年之后, 他的村社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践因一场轻而易举便获成功的军事政变而宣告结束, 他的政治生涯也因之划上了句号, 这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 也不由人对他的“非洲社会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

—

恩克鲁玛于1909年9月出生于英国西非殖民地黄金海岸(加纳独立前的名称)恩济马地区恩克罗富尔村的特威族金匠家庭。从小耳濡目染非洲部落村社制度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 并亲眼

目睹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 亲身感受黄金海岸人民的反殖斗争和运动。他在家乡的天主教小学就读, 后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在阿奇莫塔学院学习期间, 在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克维吉耳·阿格雷博士的教育和影响下, 萌生民族主义思想。1930年毕业后, 回到家乡的教会学校任教。1935年到美国留学, 开始了长达10年的艰苦留学生活和“寻找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方案”的求索之路。为此, 他广泛阅读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马志尼等人的著作。他在自传中写道“马克思和列宁对我的影响特别深”^[1](P48)]。而在他读过的一切书籍中, 最能激发他的热情是《马库斯·加维的哲学和思想》, 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主要是他的‘非洲人的非洲’哲学和‘回到非洲去’的运动”^[2](P48)]。在马库斯·加维的深刻影响下, 他的泛非主义思想逐渐形成, 并积极投身于泛非主义

的运动和实践。

恩克鲁玛的村社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时代和社会背景、个人生活经历、科学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等思潮的产物。它带有反殖民主义色彩和泛非主义情结,而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深深打上了传统的烙印。他把非洲社会的村社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渊源”,把原始村社制的基本原则,即“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集中而又有条不紊的体现”原始村社制的这些基本原则,否则,就会产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阶级分化的出现。他宣称“社会主义可以是,而且事实上也是在现代情况下捍卫了村社制原则。社会主义就是在村社组织原则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3](P18)}。

原始村社制和社会主义本身是不能兼容的,支撑两者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是完全不同的,恩克鲁玛却把这两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加纳在独立时虽然在人均收入(50英镑)、外汇储备(2亿英镑)等方面是当时黑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中广泛存留有原始村社制。恩克鲁玛认为“随着非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振兴,人们开始寻求一种与非洲社会的传统、历史、社会环境和村社基础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非洲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无甚变化。非洲的广大农村仍然保留着土地的村社集体所有制,人们在互助合作基础上进行耕种。这仍然是决定非洲社会面貌的主要特征”。^{[4](P88)}加纳的社会情况也是如此。那么,恩克鲁玛在探求国家的发展之路时是不能脱离这一实际的。

恩克鲁玛从加纳社会的自身条件出发,以“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作为各部族的粘合剂,通过这些原始村社制的基本原则来团结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各部族,这的确是他积极探求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他还希望这些原则在“现代技术社会中得到重现”,这样不但“先进的技术社会实现了”,而且“又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和深刻的阶级分化”。这就是恩克鲁玛理想中的社会,即村社社

会主义社会。而且,恩克鲁玛竭力把他所向往的理想变为现实。然而,在贯彻和实施这一具有强烈梦想色彩的理念的过程中和活动中,恩克鲁玛始终跳不出原始村社制的藩篱,被它深深所困,他的事业和政治生涯也因之窒息而亡。

二

实际上,恩克鲁玛并没有看清当时原始村社制的真实面貌。自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以来,加纳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所发展,新的阶级结构也在形成之中,这些虽然还不足以解体原始村社的社会结构,但无疑起到了较强的冲击作用,也就是说,具有原始公社色彩的村社正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恩克鲁玛却忽视了这些事实。他从非洲本身吸取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力量,作为民族的凝聚力,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鼓舞性。然而,他过于拔高了原始村社制度的基本原则。毕竟,这些原则只适合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社会,而独立初期的加纳早已今非昔比,若仍然套用旧有的制度,甚至奉若神明,则未免脱离实际,若再把这些制度运用于实践,并大肆推广,那更是矫枉过正,其影响和危害自不待言。

而恩克鲁玛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不过是用来重现非洲原始村社制基本原则的手段,在此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

他大力发展国营企业,以实现所谓的“公共利益”,为此,不惜巨资兴建炼钢厂、炼油厂、造船厂等大型企业。他明确指出加纳不允许个人致富,严格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使不少私人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甚至被迫倒闭。加纳最大的成立于1953年的曼科阿兹渔业有限公司就是典型的一例。该公司因经营有方,生意兴隆。而恩克鲁玛不让它继续发展,要该公司的年轻经理奥克兰担任加纳国营渔业公司的负责人,并把自己的公司交给国家,结果致使该私人公司经营困难。此外,恩克鲁玛在全国大力兴办国营农场和合作社。机械化的农场在1960年只有30个,到1964年增加到105个。农场职工的住房、衣物、事物和工资全部由国家提供。合作社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数量由1961年的361个猛增到1962年的1165个。

不论恩克鲁玛的初衷与愿望如何,他所实施

的这些经济政策无疑带有浓厚的“平等主义”和看似“人道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国营农场的兴办,更具有明显的再现非洲传统村社的目的。

这些试图恢复和重现原始村社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绝大多数国营企业因严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贪污盗窃、机构臃肿等原因导致经济效益很差。尽管政府向32家国营企业投资达4000万英镑,而到1963年底这些国营企业的总亏损已超过1500万英镑。不少企业因资金不足和原料短缺连正常生产都难以保证。所以,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到1966年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时,大约三分之二的企业已宣告破产。国家为了扶持国营农场,在5年的时间内投资达1500万英镑,而农场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十分落后。耗费巨资从国外进口的拖拉机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常被遗弃在丛林中任其生锈。农场职工在国家的包办下,过上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吃穿不愁,而这种泯灭个性的政策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几乎连自己都难以养活,更不用说向国家交粮了。

恩克鲁玛采取的经济上的国有化政策正如他本人反复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土地及其资源的公有制”、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原始村社制度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劳动成果的平均分配原则的翻版。他对私人企业的束缚,对个人致富的否定,是非洲传统村社中盛行的追求个人利益被视之为自私的和可耻的这一观念的反映。

恩克鲁玛把非洲原始村社制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两者之间,他把前者视为目标,后者不过是实现前者的工具。这揭示了他内心深处和潜意识里对非洲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观念形态的深深迷恋。他陷于了理论的误区,无异于给自己构筑了一个牢笼。所以,他始终摆脱不了它的影响和束缚,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也因此而具有原始公社制的特色,虽然他建造了大型的企业、华丽的候机大楼、豪华的会议中心、高等级公路等,但这些不过是给他的非洲传统村社披上了一层美丽的社会主义外衣而已。

尽管恩克鲁玛设想使非洲传统村社的精神文

明和通过社会主义手段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能统一起来,这本身是“天方夜谭”,但他希冀能做到这一点,他大大加强了手中的权力,以期借助通过强制措施所树立的个人权威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

在1960年7月加纳宣布成为共和国后,恩克鲁玛当选为首任总统,他总揽行政首脑、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全部大权。1961年他对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实行“重大改组”,自任总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1964年他在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人民大会党是国家“唯一合法的”全国性政党,使加纳成为一党制国家。对反对势力他采取关压、流放等严厉措施。恩克鲁玛政府通过实施《公民身份法》、《驱逐法》和《预防性拘留法》,把从事“非建设性活动”、“颠覆活动”、发表“有损于政府信誉言论”的人和有嫌疑的危险分子驱逐出境或送往拘留营或进行拘捕;通过《紧急状态法》的颁布,恩克鲁玛总统有权自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为了统一思想,他规定从党政高级干部到最基层的党的宣传员都必须轮流到位于阿克拉郊区的、于1961年建立的“恩克鲁玛意识形态学院”学习他的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这些方法,恩克鲁玛拥有了至高的权威。

恩克鲁玛在政治上竭力推行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针和清除反对派的极权主义的做法,虽然打击了酋长的分裂势力,但他借极端措施所建立的个人集权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是非洲社会古代土王、酋长专制统治的变种。在非洲的原始村社中,酋长和土王是神的象征和代言人,他们极受尊重,被臣民所崇拜。“非洲人对首领的概念使首领在国家历史上占有被夸大了的地位,他完全成了国家的集体命运的化身”。恩克鲁玛尽管在西方国家学习多年,但他并没有真正地脱胎换骨,他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以致在执政中有意无意地效仿。而非洲传统村社中所谓“大树下的民主”的原始民主制所包含的宽容对话、协商一致的优良传统却被他抛弃了。

恩克鲁玛的村社社会主义的治国措施尽管使加纳的社会面貌与独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振兴了加纳的民族经济,促进了教育事业的极大发展,但给加纳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他在

独立初期在西方式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采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成果因之消失殆尽,私人经济萎缩,国营经济几乎毫无效益,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到1965年国家负债达10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食品短缺,物价飞涨。恩克鲁玛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大为降低。1966年,加纳军警趁他出国访问之机,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他执政近10年的政权。

三

村社社会主义是恩克鲁玛探求的一条希望能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尝试和努力。由于时代、社会和本人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如邓小平指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他深知国家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的现实。正是基于对独立后的加纳社会面貌的认识,他肯定和赞扬在非洲延续了上千年仍然大量残存的传统村社制度,把这一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凝聚加纳各个部族的精神旗帜,以尽快实现民族的一体化。这本身无可厚非,也有其可取之处。

然而,在生产力极为低下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产生的非洲原始村社制在多种力量的冲击下,正在走向解体。而恩克鲁玛仍然企图再现人人平等、没有剥削、领袖权威得到尊重的原始村社,当然十分不切实际。

他过于迷恋非洲传统社会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把这些原则推崇到同社会主

义的基本原则相等的地位,认为必须借助社会主义才能恢复这些原则。他所实行的经济上的国有化和政治上的个人高度集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非洲传统村社中追求平衡、重视社会一致、摒弃个人利益、强调首领权威的重现。虽然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在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上有积极的一面,但由于他脱离实际,拘泥于传统,采取过激措施,竭力在加纳大地再现昔日原始村社式的人道和平等。这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错误的。

所以,尽管恩克鲁玛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发展,但由于他陶醉于自己设想的能够恢复非洲传统村社制的基本原则,他的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和实践被深深打上了原始村社制的印记。这不仅使加纳的国民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导致了他的政治生涯提早结束。原始村社制的桎梏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试验中是如此之深,以至他画地为牢,结果作茧自缚,这种教训的确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 [1]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自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 [2]克瓦尔·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 [3]唐大盾.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 [4]恩克鲁玛.非洲必须统一[M].伦敦:海涅曼公司,1963

(责任编辑 汪志强)